

从辛亥革命到 五四运动



湖南人民出版社

胡绳武 金冲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胡绳武 金冲及

责任编辑：李沛诚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3,000 印张：12.875 印数：1—14,900

统一书号：11109·221 定价：1.75元

目 录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1)
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	(28)
武昌起义告诉了我们什么?	(40)
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	(57)
民初政局和二次革命	(103)
临时政府结束后的孙中山	(191)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	(235)
——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	
辛亥革命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274)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298)
中国人是怎样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375)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历史上常常有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这时，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局势瞬息万变。胜利和失败，失望和追求，苦闷和奋起，以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交替出现，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丰富的历史遗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便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前仆后继，英勇反抗，都没有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一度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最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令人难熬的黑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环境迫使人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传统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许多人重新观察着，思考着，探索着，寻求新的救国真理。在这个旅程的尽头，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一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

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发展得极其迅猛。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新生的共和国，在许多人眼前矗立起一幅虚构的壮丽前景。他们早就梦想着：一旦“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①他们深信：过去，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那个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现在，这个障碍既经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掉，一切根本改革当然将次第推行，诸如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等，都指日可待。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

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不难看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还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

领导这次革命的中下层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但并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和勇气。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排满”二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②。他们对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③。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

① 孙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六三页。

②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六一页。

③ 谭人凤：《石叻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国的迅速成立,对他们说来,实在是喜出望外。廉价的胜利,冲昏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头脑。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许多人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内部的争权夺利开始了,连军队中也出现了难以收拾的“纷无纪律”的状况。

原来在革命中充当冲击主力的下层群众,这时早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是由于下层群众的积极参加而获得推翻清朝政府的实际力量的。抛弃了下层群众,自然也就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继续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处处遇到的仿佛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黄兴在一封信中甚至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①

革命的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成为南方政府不和谐的合奏中的基调。而当帝国主义直接出面干预、开始所谓南北和议后,一些革命党人就争先恐后地主张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妥协。有的说:“我们此时没有真实的力量,所以对北方政府以及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②有的说:只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③章太炎甚至主张“无故无新,唯善是与”^④,公然与旧官僚、立宪派人合流。革命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陷入一片混乱。

上层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向有着密切的联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六一页。

② 张国焘:《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③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六四页。

④ 章炳麟:《致袁项城商榷官制电二》、《太炎最近文录》,七二页。

系。他们过去主张立宪，敌视革命，生怕革命会触怒帝国主义，会倾覆整个封建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①。只是在革命的风暴迅速卷遍全国、清朝覆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张謇说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持君主制度，结果将“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②。这话说得十分明白：他们承认共和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实行共和制度，恰恰相反，只是要借此来结束革命，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出山，清朝政府将大权交给袁世凯时，他们就暗中同袁世凯勾结，穿针引线，以清朝退位、建立民国为条件，从内部施加压力，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孙中山，是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对帝国主义也存在着幻想，对袁世凯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本质同样认识不清，并且因脱离下层群众而缺乏足够的力量；但在当时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他曾要求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可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很快便为巨大的妥协声浪所淹没。孙中山在以后回顾道：“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③这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样，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终于将政权移交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年代久远的、压在人

① 《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号。

② 张謇：《辛亥九月致内阁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③ 孙文：《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一〇四页。

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

二

可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迷梦并没有随着革命的失败，立刻在人民心目中破产。

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着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中到来的。袁世凯在取得政权后，还需要争取一些时间，来整顿自己的力量，稳定被革命强烈震撼过的旧秩序。因此，他在表面上仍然口口声声要“矢忠共和”，表示要尊重议会的“神圣权利”。这就更使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

他们继续做着“议会政治”的美梦，认为只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可以按照“法律”的手续，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打算。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宋教仁极力鼓吹：“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①，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证他们各项政策的次第施行。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做后，“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奠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②。因此，他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扩大

① 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五页。

② 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二十一页。

政党基础和进行国会竞选上。宋教仁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于最高地位，这时却青云直上，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他的政治主张在党内也确能风靡一时，取得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它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①，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在宋教仁的策划和主持下，同盟会和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量旧官僚旧政客入党。这不只是同盟会和几个小党合并的问题，而是政党性质的改变——放弃了革命，由革命党变为一般议会中的在野党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逐步堕落的产物。

正在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经济地位和实际兴趣也在起着变化。他们中许多人汲汲地利用既得的社会地位，从事私人投资实业的活动。黄兴、宋教仁等人投资于银行、矿业、汽船、纺织等事业。各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纷纷效尤。例如在云南，蔡锷、罗佩金、李根源、谢汝翼等都参加了东川矿业有限公司的投

^① 顾敦桢：《中国议会史》，一八八页。

资活动。这种狂热的投资场面，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们，而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缩影。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渴望得到一个“宁静”的政治环境，来保障他们既得的政治权益，保障他们自由地从事实业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惜作出一切让步来求得妥协。黄兴在当时曾一度宣称的“欲专力实业，休养民力”^①，正是最好不过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为了获得并保持这种“统一”的、“宁静”的发展实业的环境，深怕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同时，他们也很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目中成为“不安宁状态”的罪人。于是，就积极地支持袁世凯这个独裁头子，尽力鼓吹“南北统一”和“新旧调和”。同盟会重要分子魏宸组（原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在北京宣称：“国事如何紧急，中央应急宜统一”，“各党派不宜争持意见，国且不保，政见何有，政策何有？”^②另一个重要分子景耀月（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说：

“总以国家为前提，不以意见为竞争，方可以救国。”^③当时，国家政权已落在袁世凯手中。他们左一声“国家”，右一声“统一”。这种“统一”，只能是统一于袁世凯之手。这种“以国家为前提”，只能是以袁世凯的意旨为前提。

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和平建设”的诚意，他们还说服内部，解散大批革命军队。黄兴在袁世凯严令南方裁兵时，“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这种态度，在他自请卸除南京留守职务的通告中说得十分清楚：“起义光复之人断无拥兵自卫之举。

①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事略，四页。

② 黄远庸：《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一，八至九页。

③ 黄远庸：《北京黄花岗纪念会》，《远生遗著》，卷一，第十六页。

嗣因北方言论猜忌环生，不审内容，每多臆测，以为南方存此机关，势同树敌”，“兴睹此情形，殊非国福，窃恐内讷叠起，外祸丛生”，“不如将留守机关早日取消，可使南北嫌隙尽泯，庶几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①。他们希冀放下武器，以换得袁世凯的谅解和信任。而结果适得其反，换来的只是鼓励并便利了袁世凯进一步扑灭南方残留的革命力量。

他们这种迷梦，到一九一三年正式国会召开的前夜，可说是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国会选举的结果业已揭晓：“众议院中国国民党议员占半数以上，参议院中则占十分之七。”^②议会中的多数，果然被国民党夺得了。一切似乎都将如愿以偿。宋教仁兴高采烈地说：“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③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仿佛已是近在眼前的、可以闻到香味的果子，只要一伸手便可以摘到了。

但是，历史无情地讽刺和嘲弄了他们。沉重的打击，恰恰在国民党人沉醉于欢乐的顶峰时突然到来。袁世凯的刀磨好了。于是，象晴天霹雳一样，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

原来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在突然到来的袭击下，立刻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孙中山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抛弃了一度产生过的对袁世凯的幻想，匆匆地中断了对日本的访问，赶回上海，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讨袁。但是另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黄兴等却竭力反对，主张“稍缓用兵”，“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

① 黄兴：《致中央及各省通告解职》，《黄留守书牍》，卷下，十八页。

② 邹鲁：《少年的回顾》，五十二页。

③ 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辞》，《宋渔父》后编，演说辞，二页。

效力不生？”^①蔡元培、汪精卫等也奔走南北，竭力谋求在妥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至于各省都督和国会议员，由于对既得利益的恋栈，响应孙中山主张的更是寥若晨星。从辛亥革命到这时，时间刚过去一年。但是，金钱和地位对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是一帖最有力的腐蚀剂。他们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志，为了力求保持自己都督、议员、官员的位置，不惜作出一切妥协。孙中山的战斗号召，不仅不能召唤他们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反而换来了一片“孙大炮”的讥刺声。

阶级，此刻也暂时抛弃了自己的政党。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这是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他们生怕对袁世凯的反抗会破坏他们发展实业的这个大好机会，因而，对孙中山的起义普遍抱着反对的态度。当时，有人在报纸上透露过他们的这种心情：“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②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产生自己的“狄克推多”，就把希望转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祈求在他的庇护下，得以平静地发展自己经营的实业。这种希望最后注定是要落空的。

广大下层群众，在辛亥革命后早已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脚踢开了。就在国民党员担任都督的南方各省，下层群众同样也不曾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有的只是残酷的镇压和日益增长的苛捐杂

① 谭人凤：《石叻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② 《癸丑战事汇录》，时评，一五页。

税。因此，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群官僚政客与另一群官僚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跟他们并不相干，自然不可能再有多少热情起来给国民党以有力的支持。

一年多前曾经鼓动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几何时，已处于分崩离析和完全孤立的境地，环顾四周，找不到多少支持和援救的力量。

于是，在袁世凯的诸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一度进行的独立和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这个失败，严格地讲，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在国民党内部自行瓦解中崩溃下去的。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的失败，首先都由于内部的叛变，广东第二师师长苏慎初、混成旅旅长张我权武力逐走了都督陈炯明，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也强行胁迫都督柏文蔚下台。湖南和福建原来态度就不坚决，抱着首鼠两端的观望心理，等到前述几省失败后，就自己取消了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取消独立的通电中，厚颜无耻地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①国民党的议员们，不再妄想凭着“议会中的多数”来约束袁世凯的行动了，只是一心恋栈自己的地位。他们竭力向袁世凯献媚，甚至由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出面，宣布削除黄兴等人的党籍，表示自己 and 这个事件无关。^②但是，南方军事行动一结束，袁世凯对他们就不用再讲什么客气了，回过头来，立刻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解散国会。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就这样昙花一现，烟消云散。

①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② 谢彬：《增补订正民国政党史》，五六页。

这一次起事的失败是必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腐烂得这样快，怎么还能指望由它来领导革命前进呢？他们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等待着他们的只是失败。这以后，孙中山继续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可是，这条路越来越窄了。他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过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过西南军阀，往后又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过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一连串的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根本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革命。许多人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还在无产阶级对它从理论上进行批判以前，已经由实践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国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才从连续不断的失败中取得教训，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政治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三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可是，烈士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这次革命对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也消除不了的。就在表面上令人难忍的暂时沉寂背后，它所引起的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却在继续向前推进。

①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一〇九、一一〇页。

首先，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支配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历来被看作“天的儿子”、“神的替身”的皇帝，居然被打倒了。“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被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孙中山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坚持写上：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切，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上激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影响只要读一读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偶像破坏论》，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重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①既然君主这尊从来被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一旦被看穿后，可以打倒；那么，人们合乎逻辑地会联想到：其它种种迷信和偶像，不是同样也可以破坏，也可以打倒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的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受到足够的评价。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同志，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议论。他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②

其次，人们对这次革命曾抱有如此热切的期待，并且付出了

①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五卷二号。

②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如此巨大的代价，最后却仍然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活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中国的现状没有得到一点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充塞社会之空气”，依然“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①。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出路。林伯渠同志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②

就这样，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就不会有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四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那是一个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日子。革命正处在退潮中。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可是，新的出路是什么？一时又没有立刻找到答案。

在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一号。

②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